

“追溯红山”参评中国新闻奖公示材料

附件 3

中国新闻奖新闻期刊报送作品目录

序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字数	作者姓名	推荐单位	备注
1	追溯红山	系列报道	14040	徐豪、陈珂、 王哲、李士萌	中国外文局亚 太传播中心 (人民中国杂 志社、中国报 道杂志社)	期刊
2	解题民企纾困	重大主题报道	12080	徐豪、王哲、 陈珂、李士 萌、张利娟、 邱慧	中国外文局亚 太传播中心 (人民中国杂 志社、中国报 道杂志社)	期刊
3						
4						
5						
6						
7						
报送单 位 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 					
报送单 位 联系人	徐豪	电话	010-68995933	手机	 (盖单位公章) 2024年3月14日 11010810479277 13911644889	
联系人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	100037	

1. “备注”栏内请标注作品刊播介质，如期刊、新媒体。
2. 填写字数/时长： **时**分**秒，系列作品填 3 篇代表作总字数/时长。
3. 每家期刊单位单个奖项报送作品数量为 1-3 个；每家期刊单位各类奖项报送作品总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6 个。

附件 4

中国新闻奖新闻期刊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追溯红山	参评项目	系列报道（期刊）
		体裁	
		语种	中文
作者 (主创人员)	徐豪、陈珂、王哲、李士萌	编辑	赵珺、徐豪
原创单位	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人民中国杂志社、中国报道杂志社）	刊播单位	中国报道
年度刊期	《中国报道》2023 年 7 月刊 “封面故事”栏目	刊播日期	2023-07-05
新媒体作品填报网址		字数/时长	14040 字
（采 作 品 编 简 介 程）	<p>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座谈会召开之后，《中国报道》编辑部即调整报道计划，将“中华文明溯源”系列报道刊期提前，派出采访组赴辽西采访报道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红山文化。采访组进行了一周时间的采访，拜访考古发掘者、研究专家，深入遗址现场，探访博物馆、展览馆，并拍摄了大量一手图片、视频。紧扣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编辑部经过两周时间的紧张写作、编辑，在《中国报道》2023 年 7 月刊推出 3 万多字、36 个页码的“追溯红山——探寻中华文明直根系”封面报道。</p>		
社 会 效 果	<p>本专题系列文章刊出后，即被《今日中国（西文版）》《中国（韩文版）》翻译转载作为 9 月刊封面专题，被《中国东盟报道（英文版）》翻译转载作为 9 月刊特别关注专题；中国网、中国新闻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进行了专题转载，中国新闻网转载的单条链接最高阅读量达到 86.5 万。被誉为“红山文化第一人”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等专家予以高度评价，拉美地区考古学者也予以关注。</p>		

(
初推
评荐
语由
)

从2019年起,《中国报道》持续推出“中华文明溯源”系列专题报道,已在海内外形成一定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结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之后,本系列报道以此为引领,追溯中华文明“直根系”,及时向国内国际进行解读,体现了“时度效”。该组报道采访扎实,内容丰富,专业水准高,讲述中华文明礼制源头和文明发展的故事,具有可读性,被业内权威专家认可的同时,也广受读者和网友欢迎。报道具有国际视野,将中华文明置于世界文明坐标中阐述,被《今日中国(西文版)》《中国(韩文版)》翻译转载作为封面专题,被《中国东盟报道(英文版)》翻译转载作为特别关注专题;中国网、中国新闻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进行了专题转载,影响广泛。

签名: (盖单位公章)

2024年3月14日

附件 5

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作品完整目录

作品标题		追溯红山——探寻中华文明直根系				
序号	单篇作品标题	体裁	字数	刊播日期	刊播版面	备注
1	追溯红山——探寻中华文明直根系	策划导语	428	2023-07-05	封面故事	
2	从红山升起中华文明的曙光	通讯	6717	2023-07-05	封面故事	代表作
3	礼出红山：史前第一次礼仪制度	通讯	3552	2023-07-05	封面故事	
4	玉出红山：“以玉为器”的精神	通讯	2347	2023-07-05	封面故事	
5	“红山古国”去了哪里？	通讯	3680	2023-07-05	封面故事	代表作
6	红山“火花”闪耀在世界文明	通讯	3861	2023-07-05	封面故事	
7	红山文化未解之谜	通讯	3056	2023-07-05	封面故事	
8	如何让红山文化“红”起来？	通讯	3644	2023-07-05	封面故事	代表作
9						
10						
11						
12						

1. 附在参评作品推荐表后。
2. 填报作品按发表时间排序。
3. **体裁**：消息、评论、通讯、专题等，请不要填写系列、连续、组合。
4. **刊播日期**：格式 yyyy-MM-dd, 例如 2023-03-01
5. **刊播版面**：刊播版面名称和版次
6. **备注**：三篇代表作必须从开头、中间、结尾三部分中各选 1 篇，并在“备注”栏内注明“代表作”字样

附件 1

报送单位诚信承诺书

我单位就参评本届中国新闻奖作如下承诺：

一、根据《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和有关通知要求组织作品评选。对申报的作品以及推荐表等材料，认真审核把关。相关作品内容和材料均已经过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的确认，均符合参评要求。

二、申报的作品不存在导向问题、抄袭、造假或内容失实；不存在重新制作、虚报刊播信息、虚报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以及参评作品与刊播作品不一致；不存在参评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或因违反评奖规则等行为受到处罚并在影响期内；不存在未按规定程序开展推荐、初评、公示。

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单位愿根据中国新闻奖评选有关处罚规定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中国记协对我单位和推荐单位，以及相关责任人、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的处罚。

承诺人（签名）：

（报送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2024年3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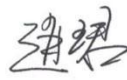
参评人员诚信承诺书

我就申报的《追溯红山》作品参评本届中国新闻奖作如下承诺：


一、根据《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和有关通知要求申报作品评选。对申报的作品以及推荐表等材料，如实填写，认真审查。作品内容和材料均已经过确认，符合参评要求。

二、申报的作品不存在导向问题、抄袭、造假或内容失实；不存在重新制作、虚报刊播信息、虚报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以及参评作品与刊播作品不一致；不存在参评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或因违反评奖规则等行为受到处罚并在影响期内；不存在未按规定程序开展推荐、初评、公示。

如违反上述承诺，我愿根据中国新闻奖评选有关处罚规定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中国记协对作者（主创人员）和编辑的处罚。

承诺人（签名）： 

2024年3月14日

代表作 1:

从红山升起中华文明的曙光

1985年10月，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23岁的女考古队员张星德捧着装有女神像的木盒，在当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领队孙守道和郭大顺的带领下，去辽宁兴城拜访苏秉琦先生。

将近40年过去了，早已是红山文化研究专家的辽宁大学历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星德还记得苏秉琦先生端详女神像的情形，“他不是像看神的塑像，而是像看亲人、家人”，那也是张星德第一次听到苏秉琦说“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在1983年11月2日，女神像整体提取出土以后，大家一致推荐，由发掘现场的唯一一名女队员魏凡捧着女神像下山——据说回到考古队驻地那段不到1000米的路程，他们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个小时才走完。一位年轻的女考古工作者手捧着女性祖先的塑像，身披晚霞，走下山岗、走出丛林，五千年的历史鲜活生动起来。

如今在牛河梁考古工作站长期驻扎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野考古发掘领队郭明，也是一位女性。“这是女神的指引。”张星德笑称，自己从事红山文化考古、研究的经历，“也都是因为与女神结下的缘分”。

红山女神像就像一把充满隐喻的钥匙，为破解红山文化之谜打开了一扇门。

辽西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始地之一。红山文化的发现始于20世纪初。1935年，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器物。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根据最早在辽西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学者梁思永的建议，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定名。上世纪80年代，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特征的重要内容。

6月中旬，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不久之后，《中国报道》采访组一行踏上辽西这片土地，探秘红山文化。

文明的曙光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何处去？这个哲学“终极三问”，推动着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不断探寻。

红山文化距今约 6500 年至 5000 年，有 1500 年的发展时期，在 5500 年前后开始进入鼎盛时期。红山文化覆盖了西辽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滦河流域及周边地区，涉及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三省份。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的郭大顺表示，红山文化是“原生型”的古国文明。今年 85 岁的郭大顺，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专访时，前一天刚从牛河梁遗址考察归来。

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与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保护区面积为 58.95 平方公里，距今 5500 年至 5000 年，处于红山文化的晚期，也是红山文化的高峰期，发掘出了女神庙、大型祭坛、积石冢群、大量玉礼器和陶器，让世界为之瞩目。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进入现代社会后，史学观点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 4000 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 1000 年只能作为传说时代，因为缺乏实物证据。苏秉琦先生是郭大顺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由他创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系统观点，在考古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牛河梁遗址发现后，苏秉琦指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夏代往前是龙山时期，龙山时期是父系社会；再往前是仰韶时代，叫母系社会，红山文化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晚期，就是母系社会那个阶段。红山文化突然出来这一套东西，与进入国家文明社会有关，甚至专业界一时都接受不了。”郭大顺回忆说，“以往说中华文明起源都是以中原为中心，长城以北的文化是受中原影响，但是没想到牛河梁遗址区先是发现玉器，后来又发现坛、庙、冢，这种成套的礼制性东西非常不一般，引发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贾笑冰表示，祭祀礼仪行为及礼制是红山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牛河梁遗址多个大型

社会公共礼仪活动设施的建设，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由石墙、筒形器所构筑的大型墓葬附属设施的建设、玉器的规范化使用与分配，表明社会等级规范的确立；与祭祀礼仪相关的筒形器与玉器的生产及专业化分工代表了生产技术和社会管理的最高水平。”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模式：裂变、撞击、融合，并指出这三种模式发生的区域，“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文化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直根系”上的牛河梁遗址，将可以考证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

“坛庙冢玉龙凤”

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一个斜口“笔筒”有关。

1981年，郭大顺在朝阳市建平县做文物普查前的培训，一位文化站站长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附近马家沟老乡家有一个“玉笔筒”。第二天培训一结束，郭大顺就骑了15公里的自行车赶到马家沟，见到了那个“玉笔筒”——这种器物一度被叫作“马蹄形玉箍”，研究者们推测这是用来束发的，现在这类器物更普遍的名称是“斜口筒形玉器”。考古工作者又找到了器物的出土地牛河梁山冈，发现了一座东西向、长2米、宽0.8米的石棺墓。墓葬中发现了一个玉环，这也是红山文化玉器在墓葬中第一次正式发掘出土。

随后，独特的积石冢、三重圆祭坛的形制相继被发现。但这个最早发现的牛河梁遗址点后来被编号为第二地点，因为第一地点——用作了女神庙遗址所在地的编号。1983年10月，在距第二地点西北约一公里牛河梁主山梁的中心部位，一个由主室、左右侧室、北室、南三室连为一体的“亚”字形多室布局遗迹经过发掘显露出来。11月2日，在主室西侧，一个完整人头塑像重见天日，震动海内外。“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似流露着经漫长等待后又见天日的喜悦，于是人们一齐围了上去……”郭大顺在后来描述说。

在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的庙、坛、冢组合建筑群中，女神庙可能为整个遗址

群的核心。结合与其他红山文化遗址的对比，可以基本认定牛河梁遗址群是整个红山文化的圣地和祭祀中心。

郭大顺将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归纳为“坛庙冢玉龙凤”，“这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郭大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牛河梁遗址已具有按南北中轴线分布的“北庙南坛”布局，庙与坛作为国家最高层次祭祖与祭天的礼制建筑，其结构与布局从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北京，表现出强大的传承力，也表明红山文化确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而红山文化中的玉器，更是被大众熟知。目前所知，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数量达300多件，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牛河梁遗址是迄今为止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地点。红山文化中显现出“唯玉为葬”的风俗，玉器已经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身份的礼仪核心物质载体；龙、凤等后世崇拜的图腾和有吉祥寓意的精神信仰已经在红山玉器上彰显，“龙的传人”从此肇始。

何以“红山”？

地处东北的红山文化，是如何形成、发展并影响后世的？

张星德用绳纹陶器、之字纹陶器和素面陶器所代表的三大族群集团向《中国报道》记者进行了阐释。她表示，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在中国北方就形成分别以绳纹、之字纹和素面陶器为特征的三大族群集团。绳纹陶集团活动在黄河中游，主要是渭河流域；素面陶集团在太行山以东的黄河下游地区；之字纹集团主要在辽西地区。

到距今7000—6500年间，绳纹陶集团衍生出了小口平底瓶、小口尖底瓶和鼓腹罐，发展了彩陶，并在素面陶集团的参与下，进而分化成以鱼纹彩陶为特征的一支和以“花”样彩陶为特征的另一支，他们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华夏集团；素面陶集团则将釜和支座的组合进化形成了鼎，这个集团可能与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之字纹陶集团在发展之字纹筒形罐主体的器物群基础上，升华了对龙的形象的表述。

“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就是这3个集团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张星德表示，在6500年左右，黄河下游地区的族群最先开始扩张，一条往内蒙古中南部，

进入山西北部和中部，最终到达山西南部地区；另外一支向北进入辽西，与之字纹陶族群发生碰撞，对当地土著进行排他式驱赶，两者以西拉木伦河为界形成平衡和认同。在距今 5500 年左右，绳纹陶族群向素面陶族群扩张，继而和红山文化碰撞、融合，从而打破了红山文化区域内原有族群的平衡，之字纹陶族群重新在西拉木伦河以南出现。

“所以此时牛河梁出现了女神庙这样大型的祭祀性建筑应当不是偶然，而是红山人追溯共同祖先，避免冲突，寻求建立新秩序的表现。他们从千年口口相传的记忆里，塑造出祖先的形象。”张星德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自女神庙阶段起，牛河梁就应该是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了。

郭大顺从古国文明角度解读说，红山古国有当地上万年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同时又与周边主要是华北平原仰韶文化有密切交流。特别是红山文化晚期，南北交流趋于频繁，如中原式彩陶在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大量出现，表现出红山先人对待异质文化因素的巨大包容性，也成为以“坛庙冢”为主体的古国出现的原动力。南北文化交汇既是红山文化在 5000 多年前进入文明社会的动力，也为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基础作出贡献。

传说与信史

“玉猪龙”，是大众熟知的红山文化器物名称。不过，郭大顺认为这个名称不准确，应该叫“玉熊龙”。

郭大顺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猪的耳朵扁宽尖，熊的耳朵短厚圆，这两者区分非常明显；红山古国社会形态以渔猎为主，熊的形象作为神化了的礼仪器物符合情理；牛河梁遗址积石冢中又多次发现熊骨，说明红山人有以熊为祭的习俗；女神庙遗址也出土过熊下颌泥塑件，也说明熊与祭祀仪礼相关。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晓晶将“玉猪龙”称为“玦形龙”，在“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时候，可以以形状来命名”。“马蹄形玉箍”和“斜口筒形玉器”的名称即是这种情况。

不过，名称背后不只是“像什么”的问题。随着考古发现，不少学者将红山文化与五帝时期的黄帝部族联系起来，且史载黄帝“号有熊氏”，这样“玉熊龙”神器与“有熊氏”之间就有了明显关联。显然，郭大顺是倾向于这种关联的。

这是一个“传说”与“信史”的辩证关系。

5000年前正处于传说中“五帝”时代。郭大顺认为，《史记·五帝本纪》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神农氏世衰”和“诸侯相侵伐”。“这就说了两个时代，神农氏是一个时代，诸侯相侵伐是一个时代。神农氏衰，可能是仰韶文化迁徙；诸侯相侵伐，可能不是打仗，而是文化频繁地交汇。也恰恰在仰韶文化晚期，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开始南北交汇；大汶口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对仰韶文化、河洛地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也北上。”

郭大顺强调，“诸侯相侵伐”就是五帝迁徙的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从考古和文献都可以印证，“这才是考古，不能只等着发掘出文字。但是具体怎么确认谁是黄帝，谁是蚩尤，谁是尧、舜，难度要大一些。”

“传说”与“信史”确实也存在鸿沟。黄帝集团的所在地，有多个版本。红山文化“有祀无戎”，极少发现象征军事的斧钺，而文献中记载的黄帝骁勇善战，曾战蚩尤于涿鹿之野。不过，黄帝之孙颛顼通过宗教改革，“绝地天通”，掌握祭祀专属权，成为天神的代言人。

“文明探源的根本目的是要复原古史。”郭大顺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考古不能对等去印证传说，但也不能回避传说。“不能只等着发现文字，殷墟发现甲骨文了，商代确定了；而二里头原来说是夏都，现在说没有发现文字，就不能确认。考古学是一个独立学科，要用自己的独立学科方法，用实物资料复原古史，让古史‘说话’。”他说。

体现中华文明的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连续性。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断，集中系统的根系就是红山文化。”郭大顺表示，红山文化为中国历史进程奠定基础，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至今、连绵不断，这对中华民族走自己的道路非常重要，也决定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道路方向。

红山先人对待异质文化因素也体现出巨大的包容和创新性。“红山文化一点也不保守，对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能够辨别，为我所用。你看红山文化中彩陶，都是外来因素，被吸收、传承和创新，并且很多彩陶被用作祭祀仪器，这就反映出红山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不是一般的高，值得我们现在借鉴。”郭大顺说。

张星德表示，红山文化上千年的族群认同，交流融合，促使了红山文化对族群的凝聚，进入了族群认同阶段。在历史发展推进到区域国家、族群大碰撞的阶段，它能够实现认同优先。这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郭明也表示，红山文化体现出以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大同”观念。开放、包容的社会特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底色，红山文化祭祀礼仪性遗址中所显示出的规范、一致性与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多样与包容性是其文化特点的突出表现。

“红山文化有 1000 年的认同基础，对这种文化认同和发展方式的认可达成高度一致，探索出自身发展的道路，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所以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选择、怎么做。”张星德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和合发展”是红山文化发展的路径，也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继承下来的传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所以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发展就是这么过来的”。

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考古，涉及中国文明史距今 5000 年前这一关键时期，是解开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把钥匙。但我们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还很有限，女神庙等重要遗址还没有深入发掘。如今，“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已经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在牛河梁考古工作站，《中国报道》记者见到参与“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十余位大学生，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女硕士生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青春洋溢，自信而充满热情，红山文化百年考古，正有着青春力量不断加入——也许未来，我们离红山先祖们的距离，会更近一点。

对话郭大顺——

红山文化为什么是“直根系”

中国报道：红山文化有什么特点，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郭大顺：红山文化距今约 6500 年至 5000 年，距今 5500 年左右开始大发展。

按照以往史学观点，中国文明史只能从 4000 多年前的夏代算起，而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把这一源头追溯到 5000 多年前。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的高峰期，发掘出了按南北中轴线分布的“北庙南坛”和大量礼制形态的玉器，将礼仪制度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反映了中国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发展道路和特点，表现出强大的传承力，也表明红山文化确为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中国报道：如何理解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郭大顺：最重要的就是礼仪制度的传承。尤其是庙与坛作为国家最高层次祭祖与祭天的礼制建筑，其结构与布局从 5000 年前的红山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北京，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象征，也是中华文化与文明连绵不断的实证。红山文化“唯玉为葬”，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和以玉龙为表现形式的龙的崇拜。从红山文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来看，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这棵大树根系里的直根系。

中国报道：也有不少人认为红山文化还不是“古国”，如何判断红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郭大顺：如果我们从专业界传统说法的文明“三要素”来看，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持续发掘，发现女神庙外墙体“护坡式”石墙结构与龙山文化早期的城墙结构相同，这也进一步证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方形山台即城址，说明第一地点已具都邑规格。在牛河梁第二地点的一座墓葬中，曾经发掘出一件红铜耳环，从当时的高温技术来看，可能已经掌握了炼铜技术。目前，文字还没有发现，也许那时候有文字，写在帛上，没有保存下来。

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红山文化 5000 多年前已经达到非常发达的程度，有王者大墓代表的社会等级分化，有祭祀礼仪的制度化、信仰的体系化，这是非常了不得的，说明当时确实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不一定非要用“三要素”来套。

中国报道：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女神像发掘出土曾引起国外的广泛关注，

神庙、神像在国外古文明中也都存在。远古历史上，它们有没有可能进行过文化交流？

郭大顺：是有可能的。比如牛河梁遗址出土过玉海贝，这种海贝印度洋才有，红山人用玉来仿制海贝，说明他们见到过这种东西，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种来自远方的信息通过这种形式留下了痕迹。从时间上来看，红山文化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的古文明在时间上相近。红山文化中有一种彩陶，上面呈棋盘格式分布等腰三角、直角三角纹和菱格纹等几何形图案，这种纹饰仰韶文化里没有，而在西亚一带常见。种种迹象表明，东西方文明起源道路虽然有差别，但又有很多共通之处，体现了文明的交流互鉴。

代表作 2:

“红山古国”去了哪里？

红山文化历时 1500 余年，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期距今 6500—6000 年左右，是红山文化孕育和形成期；中期距今 6000—5500 年左右，是红山文化全面发展阶段；晚期距今 5500—5000 年左右，红山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期，并最终形成红山文明，进入“古国”阶段。

如果从 1921 年安特生在辽西锦西发掘沙锅屯遗址算起，红山文化考古已走过百年。但对于这个形成于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存续 1500 年之久，地理范围跨越内蒙古、辽宁、河北，面积达 20 万平方公里的古文化来说，我们所知晓的也许只是吉光片羽。

碰撞与融合

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论述中国文明起源的裂变、碰撞和交融时谈道：“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与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结合有关。所涉及的范围是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

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曲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文化带。”

记者曾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看到的一幅“北方——中原文化连接示意图”，再现了这种互动。辽宁大学历史学部教授张星德师承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在她和同事近年来的研究中，一些红山文化形成的历史细节次第展开。

张星德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考古学对遗存的认知，是通过人遗留下来的物品。距今8000年左右，北方地区形成了3个重要的族群集团，以他们使用的陶器特点命名，分别为素面陶集团、绳纹陶集团和之字纹陶集团。素面陶集团主要生活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黄河下游地区，使用陶盂、陶支座组合炊具或使用陶鼎；绳纹陶集团是黄河中游的仰韶集团，流行小口尖底瓶；之字纹陶集团在辽西地区或者范围更大一点的北方，这里流行筒形陶罐。在距今6500年到5500年间，这三大族群之间由于人口的扩张、迁徙，不断发生碰撞和交流。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就是这三个集团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

为印证红山文化的碰撞融合过程，近几年张星德还对玉器进行了比对。她说，距今8000年左右，辽西土著已经开始使用玉器，器型有玉玦、玉璧等，到了红山文化早期，这样的用玉传统及器型仍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延续着，而在燕南部族植入的西拉木伦河南岸，以及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均未发现玉器。直到距今6000年左右，后者才有玉器。“而且一出现，从器型上看是斜口筒形玉器，即红山文化的马蹄形玉箍，这种器型在辽西地区距今8000年左右的玉传统里是没有的。”

在张星德看来，从最能辨识族群的器物的角度看，我们今天认为两个族群经过文化认同共同形成了红山文明，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即距今5500年左右黄河下游居民和辽西土著居民碰撞融合形成红山文明。

影响与延续

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大致在距今6500—5000年，并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的晚期进入鼎盛期，最终形成红山文明，将我国可考证的史前文明向前推进了1000年。

红山文化承载的历史发生在远古时代，遗迹遗物的发现史就是对红山文明的确证史。张星德说，红山文化发现多年以来，很难找到与传统的文明评判“三要

素”——文字、金属、城市相对应的物证，能看到的是发达的祭祀遗址，和祭祀遗址所表现出来的用玉来显示人身份的等级制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称，红山文化进入文明阶段最基础的佐证是社会结构，其祭祀礼仪制度化背后是观念信仰。

那么，既已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鼎盛期之后，红山文明是突然消失了吗？“红山古国”去了哪里？

郭大顺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总是有高潮和低潮，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夏商周更迭亦是如此，“红山文化不一定就完全衰落了”。“从东边这一路，红山玉器到了大汶口，往南去到凌家滩。特别在凌家滩有很多相似的东西。”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含山县，是长江流域一处距今 5800—53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址，学界认同它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有紧密关系。比如，这里也曾出土过一件玉人，和红山玉人如出一辙——均双腿弯曲，双臂回收置于两肩，双目紧闭，似与神灵沟通。“凌家滩遗址最近又发掘了一个勾云形玉佩，完全是红山那边的残件。”郭大顺补充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郭明提到，此前不久，考古人员在凌家滩遗址还有一个新发现。“凌家滩也处在丘陵地带，有水，但比红山多，那里的古人对建筑址的选择和红山高度相似，连大型红烧土台子的结构都很像。”两地相隔 1000 余公里，这种史前社会的上层互动称得上“神奇”。

部分专家认为，在中国史前社会，各地部落上层之间曾开展远距离文化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牛河梁和凌家滩就是这样的交流点。

从“崇龙”角度看，红山文化也没有消失。1971 年，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条玉龙，被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从外观上看集齐了鹿眼、蛇身、猪鼻、马鬃。张星德告诉记者，红山时期龙的外观基本定型，即取多个动物的某个特征组合成一个新形象，身体通通变成很长的躯体。逐渐地，到了商代，龙的背部出现了脊，身上有鳞纹图案。后面不管如何变化，龙形象都是照此样式“微调”。

不止于以上所述，重新审视红山文化的仪式圣地牛河梁，这里三层起坛、天圆地方、沿中轴线左右布局的理念，连同北庙南坛、敬天法祖的传统，均和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相类似，也印证了红山文化的穿透力。

未曾中断的文化遗产

“如果强说红山文化直接影响了多大范围，也有一点难度。”郭明表示，由于红山文化有融合、认同的基因，如果向外辐射，基本上也是潜移默化的，不会突然间向外界施加类似于征服性质的影响。回到“直根系”上，她说，虽然最后历史的重心移到了中原地区，但红山文化所体现的精神内核，在整个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缺席。

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长于建设强调，中华文明的逻辑起点——敬天法祖，在红山文化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因为红山文化所处的辽西山地，是个半干旱地区，对降水的渴望可能比南方地区要强烈得多，所以连接天人的巫在红山人中有尊崇的地位，行云布雨的龙的形象在这里有较多表现，这也是由地理环境所影响的。”

于建设表示，从文化理念传承的角度来看，红山文化由巫而王（从巫师发展出王权的雏形）、由祀而礼（从调整人神关系的祭祀发展出调整人与人关系的礼）、由家而国（由氏族发展出国家），对中华文明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文化传统始终未消解，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的基因表达。”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当然，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已经在历史中模糊了许多细节。“红山时代和商周时代相隔千年，这1000多年的社会形态和文化是如何传导的，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红山文化的理念一直注入其中，影响着后续的国家和社会形态。”于建设认为，红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有密切的关联，红山文化基因到达黄河流域后，直接推动了商文化的兴起，商文化又是周文化的直接源头，“夏商周三代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中华文明的熔炉，人们都想入主中原，这也是古时文化融合的历史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表示，未曾中断的精神成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重要支柱之一，“甚至你会发现，红山文化的精神理念离我们很近，

五千年的文明并不遥远，我们当代人跟祖先是心灵相通、传承至今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刘国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的精神成就，也是当今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对话张星德——

“绝地天通”的红山模式

中国报道：从您所研究的素面陶、绳纹陶和之字纹陶集团碰撞、融合历程，可以看出红山文化什么样的特点？

张星德：族群碰撞和文化融合始终是红山文化发展的主旋律。红山人从物质层面的融合发展到精神层面的认同，不仅体现了红山人的智慧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平、求同、共生的民族精神追求，而且开创了有别于黄河、长江流域“在祀与戎”文明化模式的红山模式——“绝地天通”，体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中国报道：红山文化晚期已经进入古国阶段，但似乎没有太多军事权力的表现痕迹，红山社会是如何实现国家权力的？

张星德：红山社会中世俗的等级权力是由与宗教相关的体系来表述的，尽管不够成熟，但在红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其玉器型制上保持了高度的规范化，应当是有规则制约的，应当是红山人通过宗教权力实现世俗统治的反映。这种在红山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超越了单一族群血缘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正是早期国家已经出现的表现。

中国报道：从今天来看，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有怎样的意义？

张星德：红山文明是构成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最重要的三个集团碰撞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的当之无愧的直根系，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先河；从排他到共生，红山文明开创性地通过集中宗教权力实现了现实社会的古国公共权力，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体现了红山人的智慧。

红山文化开创了龙文化，龙是融合、共生、创新、天人合一的产物，体现着

中华民族的和合、交融、吸收创新的思想形态；红山文化弘扬了玉文化，体现规则、制度、美德与珍贵，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和审美追求。

代表作 3:

如何让红山文化“红”起来？

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辽冀蒙三省区交界的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抵达这里后，碍于山梁交错、植物繁茂，并不能立即看清 8.3 平方公里核心保护区的全貌。从公园门口进入，循着内环路，能到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女神庙保护展示馆和祭坛、积石冢保护展示馆，它们是游客来此的主要参观点。

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以文字、图片资料为主，罗列着历代考古工作者发掘研究红山文化的成果。另外两处保护展示馆建于遗址之上，原址展示了我国迄今最早的史前神殿女神庙、有着等级差异的墓葬冢群和红山先民祭天礼地的祭祀圆坛遗存，昭示着在几千年前，这里已经升起了文明社会的曙光。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公众中的关注度持续升温。特别是 2020 年以来，原本冷门的考古突然成了热门话题，尤其是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中央电视台罕见地将直播间搬进考古现场先后 3 次直播，第三次发掘全网关注度甚至超 100 亿人次。此后以三星堆、良渚等为代表的考古遗址公园游人如织，一到节假日甚至人满为患。

牛河梁是红山文化核心区域，把可考证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 1000 多年。但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良渚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相比，却显得有些“寂寞”。对于已经逐渐步入公众视野的红山文化而言，如何让遗址“活”起来，让博物馆“火”起来，让红山文化真正“红”起来，是一个重要课题。

考古发掘进程加快

打开地图，走 101 国道、长深高速或京沈高铁，都能便捷驶往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除了正在发掘和做特殊保护的遗址现场不对外开放外，公众能在这里遍访红山先民几千年前踏过的足迹。

牛河梁遗址博物馆馆长王轩龙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学旅行工作从 2017 年启动至今的 6 年时间里，吸引了北京、沈阳等地多家教育机构和朝阳市周边中小学学生，目前各级学生累计参与研学旅行活动近百场。公园自 2013 年试运营以来，每年参观人数和门票收入以 20% 的速度递增。2023 年上半年接待参观人数接近去年一年的整体水平，今年“五一”期间旅游接待人数更是突破了同期历史。

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是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红山文化分布范围达 20 万平方公里，延续近 1500 年的时间，虽然已经有长期大量的考古和学术研究，但目前对红山文化的认识仍相当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表示，让红山文化“红”起来，考古发掘研究工作是基础，是不可或缺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牛河梁遗址区的新一轮发掘工作正在加快进程。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牛河梁工作站，《中国报道》记者看到院内绿植按照三层圆祭坛和陶片上的纹饰模样修剪成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郭明在这里接受采访后，带领记者来到第一地点的台基址。

1983 年首次发掘时，第一地点被认定为共有 4 座建筑址，其中 1 号建筑址就是女神庙，2 号建筑址面积最大，约 4 万平方米，由三座山台式建筑构成“品”字形。由于 2 号建筑址紧邻女神庙，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重新启动后，重点便是对其进行发掘，希望弄清楚它的结构甚至性质。

经新的考古发掘初步确认，这里是由 9 座石砌护坡台基建筑组成，总面积达到 10 余万平方米。2022 年，考古人员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 2 号建筑址的 7 号山台又有新的发现。7 号山台位于第一地点东侧，即牛河梁发掘报告中的“东山台”，最外侧石墙保留较为完好。7 号山台中、西部地势较为平缓，东部坡度较大。已在山台上发现了多组复杂的砌石与夯土建筑遗迹。“有一些遗迹我们之前发掘的时候都没见到过，下一阶段重点要确认 7 号台基的结构、性质和功能到底是什么，以寻求研究新突破。”郭明说。

在郭明带领下，记者眼前出现了一个带有坡度、松林密布的考古现场，山石凌乱堆叠在探方周边及其轮廓里，有的探方上面附着有保护膜。“复原遗址面貌，在红山相当难。牛河梁林子太密了，探方开挖要避免树和石头，而且整个一号地点台址面积特别大，给人的视觉冲击力会差一点。”郭明表示，“考古就像开盲盒”，将来会让人们觉得特别有突破的，兴许就是“挖一挖女神庙”，但还需要准备得更充分一点才能开始。

讲好“地书”之外的故事

公众一般很难目睹考古过程，如何讲述“地书”背后的故事是个难题。“我们和遗址博物馆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说起，到牛河梁遗址参观的一些人，会觉得看到的只是一堆石头、一堆土。如果古人真的留下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或许我们还能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郭明说。

“如何讲好红山文化的故事，让红山文化被更多公众所熟知，就不仅仅是历史与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了。如何用深入浅出的方式、用具象化的现代视听手段讲清楚红山文化已经到达的文明阶段，讲清楚红山人的宇宙观、社会观，展现红山先民的历史和成就，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区做好这篇考古学文化传播的大文章。”李新伟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国内包括良渚、三星堆、金沙、殷墟等考古遗址充分借助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传播力量构建起了自己成熟的品牌传播方式，这些都值得红山文化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提升红山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需要把学术基础、社会关注度转化为更高的游览意愿，进而转化为更深厚的文化自信，红山文化应积极打造自己统一的“文化IP”。刘国祥认为，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人，提升管理运营水平、持续开展考古科研、扩大品牌效应都需要培养吸纳更多专业人才。

记者采访的三星堆、金沙等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负责人都表示，博物馆是让更多人领悟红山文化博大精深的最佳场所，是弘扬和保护红山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建议辽宁省和内蒙古两省份的文物主管部门进一步通力配合，牵头相关红山文化的多家博物馆深度联手与国内更多的博物馆协作，共同策划打造各种主题的巡展，有力发挥博物馆宣传红山文化的社会功能，拓宽各种传播渠道；通过更多的云平

台展示红山文化珍贵藏品，为红山文化爱好者打造网上家园；同时打造精品文创产品，让红山文化在生活中不仅看得见，更能摸得着。

虽然红山文化所处区域基本都远离现在的人口稠密区，特别是核心区域位于内蒙古、辽宁交界，远离中心城市，相对于良渚、金沙等处于杭州、成都等中心城市郊区的考古遗址并不占优势，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红山文化的主要遗址与博物馆所在地与首都北京已经有通达的高铁，从北京每天有10班高铁直达牛河梁站，路程只需一个半小时左右；到赤峰每天也有10班高铁，需两个半小时左右，“完全可以考虑以北京为中心策划和推出一系列的红山文化宣传推广与文旅活动”。

红山文化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2020年10月，“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引发了观展热潮。2021年，“玉·见——红山·良渚文化展”在浙江省博物馆开展，两大文化穿越时空和地域相遇，共同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

专家普遍建议，在此前的工作基础上，可以打开思路探索更多的形式去传播红山文化，比如在更高层次上设立红山文化研究院与大讲堂，广泛开发各种形式的研学文旅项目；多与各地高校合作举办各种交流活动，积极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红山文化，提高红山文化在高校师生中的影响力；借助国家级平台的支持多参与国际传播活动，提升世界知名度，比如在日本和韩国乃至欧美等国家策划举办红山文化传播活动，在国际上形成“红山热”。

申遗续写红山文明

2012年9月，红山文化遗址列入国家文物局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遗址点有朝阳市的牛河梁遗址和赤峰市的红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2014年，朝阳市与赤峰市签署《红山文化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备忘录》，宣布对红山文化联合申遗。

王轩龙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启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工作，借此次更新的契机，牛河梁遗址按照国家重新调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要求，目前正积极编制各项申报材料，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申报工作。

申遗成功无疑意味着更好的弘扬和更多的引流。王轩龙说，辽宁省为此高位

推动，把申遗列入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朝阳市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朝阳市还将牛河梁大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纳入《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为进一步进行研究价值阐释，紧随2020年国家文物局颁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年—2035年）》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衔，联合河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机构成立合作团队，申报红山文化考古中国项目。2021年，“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获批。

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方式和格局已被学界普遍认可。郭明介绍，此次考古中国项目会更注重“文明”视角，重点研究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格局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红山先民是否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红山文明与中原地区的文明相比有哪些异同等，有望破解红山文化的诸多未知问题。

王轩龙表示，新的学术成果将进一步支撑申遗工作。